



学者看法

中国经济：世界格局之变中的稳定源与引力场



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机器人拳击大赛”精彩上演。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持续发力，着力扩大内需，激发内生动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为世界经济提供不可或缺的需求支撑。

2025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展现出关税逆风中艰难前行的世界经济图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但合作共赢、开放包容仍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面对关税逆流，加强国际合作、推动经济转型、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普惠包容起到重要作用，而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正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

发达经济体增长动能不足与内生性困境

2025年上半年，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增长动能减弱的严峻挑战，增长势头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更为深层的是，发达经济体的内生结构性困境在关税逆风中进一步放大。

美国以邻为壑的关税政策并未带来预期的制造业回流，反而推高了本土生产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形成“反噬效应”。企业为规避关税而提前囤货的行为扭曲了正常库存周期，导致一季度GDP环比萎缩，二季度部分缘于“抢进口”效应减弱后的基数调整而出现小幅增长，但难以持续。关税措施导致物价水平上涨，侵蚀居民实际购买力，使得占美国GDP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PCE)增速骤降至1.4%。与此同时，资本信心正在衰减。瑞士再保险公司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严重削弱美国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随着全球供应链效率下降，美国的平均通胀率可能呈现结构性上升。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则因对美出口依赖和产业链关键，更直接地承受了“连带伤害”，增长势头明显弱于新兴市场。

发达经济体科技优势面临新兴力量的强劲挑战，传统产业转型缓慢，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再加上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矛盾不断加深，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体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越是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手段维持竞争优势，就越可能加速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下滑。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关税壁垒从来不是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有效工具。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未能挽救国内产业，反而导致全球贸易急剧萎缩，加剧了经济大萧条的灾难性后果。突破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而非筑墙设垒。发达国家需率先反思其贸易政策逻辑，摒弃零和思维，以开放合作的态度重塑全球经贸秩序，才能真正摆脱当前的增长困境。

全球南方的集体崛起与经济韧性来源

与发达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南方国家展现出令人瞩目的经济韧性与增长活力。当前，全球南方国家货物贸易占全球比重达到45%，经济总量占比超4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0%，成为低速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亮色。全球南方的经济韧性源于多方面的结构性优势。内生增长动力减少了对传统市场单向依赖。全球南方国家人口规模大且相对年轻化，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释放出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内需基础，有效降低了对传统发达经济体市场的过度依赖。

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核心动能。许多国家不再局限于原材料出口，而是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和制造业升级，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同时在数字经济、绿色技术等新兴领域积极布局，寻求弯道超车的机会。这种多元化战略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传统风险，并在全球格局变动中找到新的增长点。

南南合作的深化为抵御外部风险提供了强大支撑。面对全球性的“关税逆流”，全球南方国家愈发认识到加强内部合作的重要性。“金砖+”、“上合+”等合作机制日益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持续释放红利，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稳步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积极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加强本币结算安排，有效增强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这种以发展为导向、以互利为基石的合作模式，开辟了更大的政策空间和更稳定的增长环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国家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既有的全球经济规则，而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它们通过多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探索适合发展中国家特点的开放发展新模式，为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提供了重要的集体韧性。这种集体崛起不仅改变了全球力量对比，也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角色：稳定源、引力场和关键力量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中，中国经济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上半年5.3%的增长率，摩根士丹利、高盛、瑞银等外资机构纷纷上调增长预期，以及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热情高涨，均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全球吸引力。

以强大韧性和发展潜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源”。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持续发力，着力扩大内需，激发内生动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为世界经济提供不可或缺的需求支撑。中国巨大的市场持续释放需求潜力，为全球供应商提供了重要出口目的地。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全球供应链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制造的稳定供给有效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保障了众多国家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中国不搞“脱钩断链”，而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这种稳定性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显得尤为珍贵。

以开放合作成为汇聚发展机遇的“引力场”。尽管全球保护主义升温，中国依然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向世界敞开大门。一系列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保护外商投资权益的政策措施接连出台，进博会、链博会、消博会、服贸会等国际盛会持续发力，为各国企业分享中国大市场机遇提供了广阔平台。2025年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逆势增长11.7%，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亮眼，表明国际资本对中国长期发展前景保持信心。中国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并在积极商签高水平自贸协定，不断拓展面向全球的经济合作网络。

以多边主义理念和务实公共产品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关键力量，中国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化解包括“关税困局”在内的全球性挑战。中国倡导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争端，为化解当前全球贸易紧张提供了建设性思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中国以自身发展经验、技术与资金优势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拓展发展空间。中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数字治理等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为构建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包容共赢的国际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投资合作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史全伟

理论热点面对面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中流砥柱之姿，引领全民族抗战取得了辉煌胜利。当时国家权力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手中。在这种背景下，为什么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呢？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概括：“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笔者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方面，通过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对比，论证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的科学论断。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积极倡导并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是当之无愧的团结抗战核心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国民党却实行“不抵抗”政策，对日妥协退让，声称“攘外必先安内”，执意打内战。而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庄严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大局为重，尽弃前嫌从中斡旋，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委实不易，而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为不易。全民族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团结抗战局面几度濒临逆转。面对危难局势，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采取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连续打击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共产党人的措置得当，不仅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不继续坚持抗战，是当之无愧的团结抗战核心。

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曾评价：“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声光几出

国民党之上”。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全民族抗战。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一个鲜明体现。

中国共产党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提出和实施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领导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战主战场，是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全民族抗战初期，人数众多的中间力量，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掌握全国政权的中国国民党身上。而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只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不愿意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不善于发动和依靠人民大众；同时，国民党还总是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支持和援助上。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强调抗战是涵盖经济、政治、军事尤其是包括全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存在，“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和全国人民总动员等一整套措施，标志着全面抗战路线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历史证明，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抗战中的科学运用，是全民族抗战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

为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必须明确地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论持久战》的卓越之处，不仅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而且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

全民族抗战初期，由于以阵地战为主，一味被动防御，中国军队虽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企图，但自身在惨烈的消耗战中蒙受巨大损失，无数爱国将士饮恨沙场。随着淞沪会战失败、首都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内部弥漫着悲观情绪。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中国共产党从我力量对比尤其是武器装备悬殊的实际出发，确定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和游击战战略方针，始终战斗在抗日最前线。

在战略防御阶段，当国民党军队败退之际，八路军、新四军义无反顾地挺进敌后，创建一系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

场。在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抗日军民在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主战场，实现毛泽东“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的预言。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共作战12.5万多人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多人，抗击了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对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另一鲜明体现。

中国共产党在斗争实践中有力地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历史重任，全民族抗战初期，毛泽东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为了胜利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在斗争实践中有力地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的自觉性。整风运动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全党新团结和统一。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作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政权建设方面，国民党这个曾一度获得全国认可的战时政权，因其拒绝革新政治，无意改变一党专政，经历了由有一定生气和权威性的抗战建国领导中心向日益专制和腐朽的一党专政工具转化的过程，导致弊窦丛生，大失人心。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根据地以抗日、民主的旗帜把民众紧紧凝聚在一起。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这些有力的政策措施体现了党实行民主政治、接受人民监督的诚意，体现了政治上的胸襟与自信，为统一战线、全面抗战提供了制度保障。

经济建设方面，因税收和公债收入不足，军费激增，国民政府大量增发法币，导致物价

飞涨；官僚资本通过囤积居奇、操控外汇和走私等手段垄断资源，导致国统区经济恶化，民众对政府不满加剧。相反，为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抗日根据地掀起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

文化建设方面，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推行文化复古主义，打压进步文化，企图建立文化独裁统治，从而不得人心。相反，中国共产党开展广泛的文化建设和精神动员，提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目标，打造党领导下的文化队伍，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发展了抗日的文化教育。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建设，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坚强而主动的精神力量，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凝聚起伟大抗战精神，为中国的抗战提供了文化和精神滋养。

作风建设方面，国民党虽三令五申惩治贪腐、整饬吏治，但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基本成为一纸具文，没有实际约束力。西安当时是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中心，文恬武嬉、吃酒打牌、跳舞嫖妓现象突出，有人甚至借机大发国难财。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党的形象和人心向背高度来看待党群、干群关系，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保持革命队伍旺盛的斗志和廉洁的作风，最终以“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经济发达、文化先进、作风优良，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独裁、经济停滞、文化专制、吏治腐败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这一当时国内广泛流传的说法，反映了战时的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又一鲜明体现。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伟大抗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其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共同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上述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方面的对比看，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倡导建立、积极推动、坚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并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中流砥柱”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历史作用客观且形象的定位。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专家系列谈

周裕兰

当每个中华儿女都能在文化符号中确认“我们是谁”，当各族群众都能在符号互动中感知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如参天巨树，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节庆符号的情感凝聚效应

传统节日的现代化诠释为培育群体共识提供了生动载体。春节民俗活动焕新，衍生出“网络中国节”等形式，春节期间各平台民族特色拜年视频播放量十分可观。壮族“三月三”通过在线对歌、云上舞狮等形式各地群众实现跨地域互动。这种节庆符号的创新性发展，实质是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使情感共鸣突破物理空间限制。

地方性节庆的全国化传播印证了文化符号的整合功能。那达慕大会从内蒙古草原走向沿海城市，火把节从彝家山寨登上都市舞台，这些原本具有地域特征的节日正在成为共享的文化符号。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各民族儿童共同传递国旗的场景，与56个民族代表共擎火种的瞬间，构成了新时代节庆符号的经典意象。这种符号再造过程，本质是将多元文化元素熔铸为统一的认同标识。

文化符号创新的实践路径

数字技术为文化符号传播开辟新维度。敦煌研究院打造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30个洞窟高清图像全球共享，其中包含大量反映民族艺术交融的壁画雕塑。当梨园服饰

与唐代纹样通过虚拟现实技术重现，当南诏乐舞借助动作捕捉技术复原，技术创新正在重塑文化符号的感知方式。在西藏，数字化的布达拉宫、阿里古格虚拟复原，让更多人领略雪域文化瑰宝及其与中华文明的紧密联系。特色文化符号的数字化建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富的资源。

文化符号的产业化具有战略价值。“中国节日”系列节目通过影视化表达使传统符号焕发新生，《唐宫夜宴》《洛水水赋》等作品融合多媒体艺术元素，获得群众的喜爱。民族地区推出的“非遗+”模式，将苗绣、藏毯等传统技艺转化为时尚符号，既延续文化记忆，又创造经济价值。这种产业化路径证明，文化符号的活化利用能够实现精神认同与物质发展的双增益。《哪吒》系列国漫的成功不仅在于票房与口碑的“破界”，更在于其内核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立心”，这种“立心”之道，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密码的密钥：不以同质化抹杀个性，而以共同价值凝聚共识。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再现各民族史诗，借助社交媒体传播中华民族善治思想，在交流互动中消解偏见，在交往共享中织就共同精神纽带。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要深刻领悟党中央擘画的蓝图，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长治久安、巩固发展民族团结、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文化认同建设融入此进程，构建多层次的文化符号体系，形成立体化的认同培育机制。每个中华儿女都能在文化符号中确认“我们是谁”，当各族群众都能在符号互动中感知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如参天巨树，根深叶茂，生生不息。这既是文明传承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四川民族学院副教授)

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推动各族人民的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离不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体系，这些承载着集体记忆与精神价值的文化标识，既是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纽带，更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文化符号构建民族团结的理论逻辑

文化符号作为民族精神的外在表征，其本质是群体意识的物化表达。中华文明从甲骨文到青铜器，从《周易》到《史记》，通过符号系统构建了群体认知框架。这种符号体系兼具历史积淀与现实认同的双重特性。长城作为横亘万里的军事防御工程，在文化符号层面已升华为民族精神的具象化表达；黄河九曲东流的自然形态，演变为百折不挠的民族性格象征。这些符号通过代际传承形成集体记忆的存储介质，使个体在文化解码中获得共同的身份归属。

语言文字作为最基础的符号系统，在当代展现出新的时代价值。普通话推广工程实施以来，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超过80%，“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更是有效化解了困扰民族教育“听不懂”的难题。当藏族学生学会用标准汉语讲述“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这种语言互通不仅消弭了沟通障碍，更重要的是构建